

天津人民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劳动节

郑学富

1949年12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将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定为法定节日, 全国放假一天。1950年5月1日, 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劳动节, 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作为我国工业城市的天津, 也以集会、游行、报纸出专号等形式热烈庆祝这一意义非凡的节日。

举行盛大集会

1950年5月1日早上五六点钟, 天津的大街小巷就响起了锣鼓声, 全市各行各业劳动者5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民园体育广场, “偌大的体育广场里顿时变成了人海、红旗的海, 锣鼓声和歌声, 像海洋风啸和波涛, 响彻云霄, 象征着劳动人民的团结, 显示着劳动人民的力量”。

上午10时, 庆祝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大会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 现场民众随着齐声歌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致辞。他号召全市工人继承光荣的斗争传统, 展开大生产竞赛, 巩固我们的胜利。

市长黄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豪情满怀地说: “今天纪念五一劳动节, 我们特别感到兴奋和快乐。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天津工人在解放一年多来, 伟大的创造和成绩, 我们看到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 已经组织得更强壮了!” 同时, 黄敬指出当前还面临的一些困难, 并指出: “这些困难和痛苦, 是暂时的, 是可以克服的。” 黄敬号召全市人民勇敢地担当起五大任务, 他提出: “在今天五一节, 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我们当前困难, 和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把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担当的任务担当起来。” 五大任务是: 一、继续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尚被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国土; 二、“展开生产大竞赛运动, 努力生产, 提高数量质量, 减少浪费, 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运动当中, 全体工人、工程师、职员团结一致, 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与积极性, 开动脑筋、想办法、出主意, 从生产竞赛运动中, 改革我们公营工厂中的旧的不合理的制度, 建立新的科学化的合理制度, 以扫除障碍, 求得生产的更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在私营企业中的职工, 本着劳资两利的原则, 继续发挥主动的精神, 团结资方进行协商会议, 找出办法。劳资两利, 搞好生产, 克服困难, 渡过难关。工厂和工会干部, 要力求克服工作中的不深入和官僚主义作风, 在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党员团员中, 应该密切的团结和联系群众, 和大家在一起搞好生产”; 三、“救济失业工人。除政府救济外, 同时也要求工商业家和在业工人捐出一部钱来, 作为救济失业的基金。在业工人应发挥友

举办游行庆祝活动

纪念大会结束后, 参会者分4路在市内游行, 隆重庆祝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游行队伍以高举国旗, 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及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打着各色彩绸旗帜、巨像标语, 接着是秧歌队、腰鼓队和宣传车, 在嘹亮的歌声与锣鼓声中井然有序地前进, 展示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游行中, 许多工厂的工人举着各式各样的统计图表, 上面记载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生产成绩和今后的工作计划, “以劳动和创造的具体行动来纪念五一劳动节”, 并借此表达“准备以更加巨大的生产成就, 为祖国献礼”的强烈愿望。值得一提的是, 纺织机械二厂的工人游行队伍颇具特色——他们装扮成“原始人”, 满身涂黑, 披着树皮, 拿着石槌、椰子等, 胸前悬挂着“劳动创造世界”的字样。队伍所到之处, 观众夹道观看。游行活动持续到晚上才结束。

夜幕降临时, 工厂、机关、学校都纷纷举行庆祝晚会, 继续欢度着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天津市音乐工作团、群众剧团、各区人民文化馆等文



1950年5月1日, 天津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 纪念国际劳动节。

爱互助的精神帮助失业的弟兄”; 四、“努力学习政治文化技术, 使我们能更提高一步, 以便担负将来更巨大的国家建设任务”; 五、“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学习苏联的经济, 巩固和苏联以及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友谊, 以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

天津市一等生产劳模张德安、王家珍和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丁一等也在大会上先后发言。大会还发起通过了开展要求禁止原子战争的签名运动, 并决议成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天津分会。

新闻媒体推出“五一节宣传专号”

1950年5月1日, 这一天, 天津各新闻媒体也纷纷增加版面, 推出各种精彩纷呈的“五一节宣传专号”, 从不同的角度宣传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意义, 倡导劳动最光荣的理念。这其中, 民营报纸《进步日报》的版面安排颇具创意,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进步日报》是由天津原《大公报》转变而来, 于1949年2月27日在天津创刊。它是解放区第一张民营报纸, 也是当时解放区唯一的一家民营报纸, 面向全国发行。5月1日, 《进步日报》经过精心策划, 增加到10个版面, 以多方位、多层次的方式为读者解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进步日报》在第一版, 发表了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 并刊登了新闻《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今晨在民园盛大举行》《首都五一前夕充满欢乐气氛》《庆祝五一劳动节, 电台今播特别节目》《苏联人民庆祝五一 红场将举行阅兵》等有关五一劳动节的新闻和“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为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而斗争”的五一口号。

《进步日报》还用较大篇幅刊登了社论《认识今年的五一》, 向读者阐述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重大意义。

文章指出: “今年的五一节, 对于中国更是具有非常意义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 团结了全国人民, 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英勇斗争, 这是获得全国解放胜利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日。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全国人民相互团结一致, 共同克服暂时困难, 巩固已得胜利果实的日子。” 社论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也提及了暂时存在的困难, 并提出, “只要团结互助, 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并开拓光辉灿烂的前途”。

第四版以后为结合形势对天津市五一劳动节纪念相关活动的报道。第四版是介绍“本市私营工厂职工举行座谈会”的专版, 报道了参加座谈人员的发言内容, 着重提及了广大职工协助资方发展生产、共克时艰的情况。第五版为天津工业企业、商家公司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加紧生产、开展让利推销活动的报道。第六版为“迎接红五月, 庆祝劳动节”职工美术作品展览特辑。第七版是专版, 重点介绍了天津市工人文艺演出多幕话剧《不是蝉》的盛况和剧评。《不是蝉》是由石家庄市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的多幕话剧, 讲述的是解放初期石家庄铁路工人“促先进、帮后进, 齐心协力进行劳动竞赛”的故事。在北京演出后, 引起很大轰动。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 “农民看《白毛女》, 工人看《不是蝉》。” 第八版详细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和意义以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相关文艺作品。第十版为特辑, 介绍了上海广大工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协助私营厂商克服困难的先进经验。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

史海
观澜
SHIHAIQUANLAN

红二十五军长征过镇原

何等强

1934年11月, 活动于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五军,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 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 实施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一路浴血奋战, 经湖北、河南、陕西等地, 于1935年8月1日进入甘肃境内。在攻克两当、天水北关、秦安等地、消灭大批敌人后, 于8月30日由平凉四十里铺强渡泾河, 翻越草峰崖、潘杨洞, 进入镇原境内。

红二十五军一进入镇原县境内, 消灭了国民党新城、平泉镇公所武装, 活捉了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国民党镇原县警察局长等人。

9月1日清晨, 红二十五军从新城、平泉出发, 沿途发布告、贴标语, 向沿途的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向行至姚家川时, 军部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军民大会。会上红军部队首长讲话, 号召军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随后, 红军兵分两路: 一路翻过中家源下茹川, 经路坡、五里沟, 西绕县城北上临泾原, 越过交口河, 再经孟坝向东前进; 一路沿洪河而下, 经桃园、张毛翻过原郑下茹河川, 又经双河、桑树坪北上临泾原, 再经毛家铺、唐洼, 越过交口河到达太平镇, 两路部队在席坡村

会合宿营。

红二十五军进入镇原后, 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得到了一个休整和筹补的机会。在休整的两天时间里, 红军采买补给, 休整筹粮。在采买补给时, 他们尊重当地群众, 对老百姓和和气气, 按照当地物价公平购买商品; 宿营之处, 红军指战员纪律严明, 不随便进民房, 不吃老百姓家的饭, 即使需要什么东西或吃老百姓家的饭都会付钱, 借用炊具、门板等都在第二天如数奉还。广大红军指战员到了老百姓家里, 亲亲热热拉家常, 自觉为老百姓挑水、劈柴。给镇原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前清进士焦国理老人写了一副大红对联: “红光遍天下, 保护善人君子; 军队援国家, 铲除土豪劣绅”, 并把它张贴在自家的大门上, 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红军的拥护和信赖的深厚感情。就连国民党县政府官员朱昌民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也称: “共军对贫民赐予衣食, 所购之零星东西皆出钱买来, 如无线即将抢来之布匹粮食等物以之相换矣。”

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镇原县虽然只有短短的3天时间, 经过的也只有一部分地区, 但红军的事迹在镇原迅速广为流传, 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也永远地扎根在镇原民众的心里。

史海
观澜
SHIHAIQUANLAN

解放军爆破攻克临汾

杨治钊

1948年3月, 为全部解放晋南, 策应中原、西北战场作战, 并为夺取太原创造条件, 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统一指挥所部第八、第十三纵队和大岳军区部队及晋绥军区部队一部夺取临汾。针对该城设防坚固和攻城部队重武器少等情况, 决定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攻城手段。

临汾县城国民党守军仗恃2.5万余兵力和坚固城防, 负隅顽抗。1948年3月7日, 临汾战役发起, 八纵二十三旅在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下, 决定由工兵指导步兵挖掘坑道并做好爆破准备。

从4月5日起, 以东关小北门为中心, 开始向城东关城墙掘进, 同时展开外壕争夺战。前进途中, 二十三旅先后排除敌人直接反扑、向外壕注水、从城内挖掘反坑道等阻挠。至9日, 二十三旅官兵成功挖通4条破城坑道支援炮兵进入射击阵地。当夜, 二十三旅挑选120人组成装药队, 把9000公斤炸药分别装入3条坑道。

10日, 3条坑道同时起爆, 将城墙炸开25米和57米两个大缺口。突击队上城头, 迅速占领突破口, 随即向纵深发展。二十三旅二梯队紧跟入城, 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六十九团三营入城后, 顺东大街直插敌六十六师指挥所, 歼敌一部。徐向前果断命令后续部队跟进, 很快消灭守敌, 夺取了东关。

此后, 解放军迅速扫清国民党外围阵地, 并挖掘多条坑道接近临汾城。

鉴于东关失败的教训, 狡猾的敌人立即在临汾城墙上每隔50米加修1个地堡及横墙, 将东城靠墙200米内房屋全部平毁, 加修内壕和壕沟内沿地堡; 在东、南、北三面城墙下方挖掘防御坑道, 坑道底部设“听音缸”, 派士兵监听解放军坑道挖掘情况, 一旦发现情况, 就以爆破手段进行“反坑道作战”……同时, 太原敌机也日夜出动, 向临汾城外解放军阵地以及可能挖掘坑道的地方投下炸弹、燃烧弹, 并施放毒气弹。

晋冀鲁豫军区前指再次调整部署, 二十三旅坑道作业队在兄弟部队工兵的配合下, 突击挖掘、维护长110多米的3条坑道。5月15日, 二十三旅和兄弟部队工兵终于将坑道挖至临汾城墙脚下。16日下午, 两条坑道完成了药室构筑。

17日12时, 解放军已完成1号坑道黑色炸药6200公斤、2号坑道黄色炸药3000公斤装药任务, 同时二十三旅突击团在右, 二十四旅突击团在左, 均已进入东大门以北至第二突出部之间地带待命。17时, 解放军大炮向守敌射击, 19时50分, 坑道成功爆破, 将东城城墙炸开两个近40米宽的大缺口。

二十三旅、二十四旅突击队迅速登城, 其他部队随即在炮火掩护下突入城内, 向城内纵深实施割裂和合围。经过激烈巷战, 至24时, 全歼国民党守军, 临汾战役结束。至此, 晋南地区全部解放, 吕梁、大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八纵二十三旅战功卓著, 被晋冀鲁豫军区前指授予其“临汾旅”称号。

史海
观澜
SHIHAIQUANLAN

一颗子弹解放一座县城

吴学军

1949年5月, 在解放浙江的战斗中,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奉上级指示, 于安徽石台县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歼敌一个师后, 率师部命令直插赣线, 沿赣线向浙江境内发起攻击。在九十五团的猛烈打击下, 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力量顷刻间土崩瓦解。九十五团指战员克服高山峻岭、道路崎岖、天气多变等困难, 昼夜兼程, 猛追逃敌。该部在前进途中多次与敌激战并取得胜利, 其中在突破衢江战斗中, 九十五团仅用一天时间就击溃了国民党大量守军, 俘虏安徽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以下5000余人, 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11日天刚拂晓, 九十五团副团长严大芳奉命带两个排战士, 分乘刚缴获来的三辆汽车直奔敌人盘踞的云和县城。第一辆汽车驶至距云和15里处时, 遇到云和县城国民党县政府的办事员出城为国民党八十五军催粮。严大芳遂以国民党军官的口气诱导来人讲出了云和县城的兵力部署。原来, 云和县城的主要守敌由三个县的保安队拼凑而成, 城里还有一些溃退下来的国民党零散部队, 分布凌乱, 指挥不统一, 而溃退中的国民党八十五军尚在途中。严大

芳当机立断, 决定让战士们化装成国民党八十五军士兵, 把汽车一直开进城内, 解放县城。

当严大芳率部以“八十五军先头部队”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开进云和城时, 国民党县政府及保安团头目前来迎接。严大芳向他们宣布“接管城防”, 又命令国民党县长派人把各部守军喊到县政府大院“集合训话”。不久, 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和保安队员陆续来到大院。解放军战士随即控制了制高点, 并将县政府包围起来。严大芳见一切布置妥当, 便大声宣布“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命令在场人员立即投降。

在场的国民党县政府人员和保安队员300余人听到解放军几个字, 立即举起双手。经清点, 发现只有一个三层炮楼里的守敌, 没有来县政府集合。

严大芳了解到这个炮楼由一个保安副大队长带着60余人把守, 就率战士前往炮楼下, 让战士向守敌发起政治攻势, 劝守敌投降。但敌副大队长顽固不化, 不但拒绝劝告, 还偷偷举枪准备向炮楼下的解放军战士射击。但他刚一探头瞄准, 就被严阵以待的严大芳一枪击毙。60余名守敌一见解放军如此厉害, 顿时把武器抛出炮楼, 乖乖走了出来。

抗战中的第二十二兵工厂

贾晓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为坚持抗战, 国民政府制订了《西南西北工业计划》, 确立了以西南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战略, 一批企业从东南沿海搬迁到西南大后方。1936年9月7日在南京成立的军政部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也不得不停止正在进行的厂房工程建设, 迁往重庆。

在民生公司的协助下, 筹备处用1个多月时间, 将150余人以及所有资料、物资、器材于1938年元旦分批转移至重庆。

新厂址最后选定在张家溪, 由于日机轰炸频繁, 重庆电力、原材料供给困难, 难以保证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作为抗日大后方的云南, 除远离战火外, 还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两条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 可解决军工厂的原材料和设备进口问题。不久, 国民政府决定把工厂筹备处迁到昆明, 并勘定昆明南门外柳坝村作为新厂址。

在各方协力配合下, 新厂建设第一期工程在1938年8月15日完工。筹备处、临时工场、技工训练班陆续迁入, 留渝物资也经贵阳运到昆明。

经过紧张的准备, 1939年1月1日, 昆明军事光学器材工厂(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厂)正式成立。第二十二兵工厂是当时我国唯一的光学仪器厂, 该厂成立后, 一面克服重重困难, 搜集仪器样品资料, 一面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全厂上下的一致努力下, 投产仅3个月就成功制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台光学望远镜——“6×30”双筒三棱军事望远镜, 其综合性能基本达到了当时国际水平。很快, 第二十二兵工厂又成功研制出炮兵用80CM倒影望远镜、迫击炮瞄准镜、微光夜视仪、微光像增强器、红外变像管、五角望远镜、指北针等军用品, 并投入批量生产, 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战。

1940年10月, 为躲避敌机轰炸, 第二十二兵工厂将全部人员器材撤往建在滇池的出水口处(昆阳县海口镇)的测远镜(分)厂, 并凿山开洞为厂房, 很快又批量生产出前线急需的光学仪器。

1942年1月, 为节约经费和统筹管理, 相距不远的第二十二兵工厂和第五十一兵工厂两厂合并, 改称第五十三兵工厂, 占地面积4830亩, 拥有进口机器设备近千台, 员工及士兵2400余人。由于全体工人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加上严格的管理等因素, 据统计, 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止, 第二十二兵工厂作为第五十三兵工厂直属的一个主要厂, 共制造望远镜11250具, 测远镜567架, 炮瞄镜3780架, 行军指北针31310件。此外, 第二十二兵工厂以实际行动直接投入抗战。他们同机枪厂等兵工单位先后组成多个游动修理队, 开赴湖南、广西、贵

州、重庆等地, 修理了数以万计的光学仪器和各种军械, 后又组成隶属于远征军司令部的滇西游动修理队, 参加了收复滇西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的战斗, 并为中国远征军修理了枪械2.7万多支(挺), 火炮971门, 光学器械222件, 军用品1万5千多件, 受到盟军及远征军司令部的嘉奖。

抗战期间, 第二十二兵工厂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客观上也为云南以后的工业化进程和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谋求工厂的煤炭自给, 热衷于发展地方工业, 水泥厂、造纸厂、火柴原料厂、纱厂附设机器厂也相继到海口择址建厂, 道路的开通以及人才、资金、技术的随之流入, 为当地工、农、渔、商业的综合发展创造了条件。该厂为了提高员工的技术文化水平, 曾开班办校, 开设数学、机械绘图、机械学、理化、外语等课程, 也招收当地青年学习, 客观上为当地培育了高质量的产业工人和管理人才。而军事工业的发展, 也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1949年云南解放前夜, 国民党曾试图将该厂整体搬迁至台湾, 该厂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 响应卢汉起义, 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权, 参加人民阵线”,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扑, 成立护厂大队, 终于使工厂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